

第十六篇 朝鲜朝的阳明学及其发展

第一章 阳明学的实质及其 向韩半岛的传播

阳明学是由明朝的王守仁（1472—1528）创立的，其思想正如钱德洪所总结的那样，学问有三变，教亦有三变。据说，他有“五嗜好”。一讲侠义，二善骑射，三好文章，四迷仙道，五信佛教。后来，他在见到吴与弼的门人一斋娄谅后才转向儒学的。

所谓“教有三变”，开始对朱子的即物穷理法存有疑心，此为一变；后悟出了心即理，此为二变；最后主张知行合一，此为三变。他的主张与朱子不同，不是先知后行，而是知行合一。开初，他主张静坐修炼，后来，在平定了宁王之乱后由于受到武帝身边心腹的诬陷和谗害，他在痛苦的思索中创造了侍上磨练法。正德十六年（1521），他提出了致良知说的主张。因而，阳明学的根本是致良知说，即心知、人情、欲望等的知、情、意三要素。致良知系指生命力的完全发挥及其实现。“良知只有一个，那就是神灵的作用，即神活动，即‘流行’，即气凝集，即精。”^①“天即良知，良知即为天。”^②“人之良知即为草木、瓦石之良知。天地若无人之

① 参见王守仁《传习录》中。

② 参见《传习录》下。

良知则难称天地。’^① 良知是所有人都具有的先天本能，如用天体学的观点加以发挥的话，良知也可以说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根本的生命力和能力。

他侍上磨练，并不忽视知、情、意的自然存在，那是为了尊重先验，并要在这样的事中发挥自己先天的良知。

“良知只作用于声色财利，若要获得良知，则应清明透彻，不应有一星半点的灰污，在声色财利上碰壁，也难说没有自然法则之作用。”^②

如上所述，声色财利是在先验的情与欲中领悟出自然法则的作用的。而且，他还把感情的自然活动称为良知的作用。

把知、情、意的自然活动不仅仅归咎于恶这一点和朱子学的本意是不相一致的，在论点上也是有本质区别的。

如果说朱子的论点是“相应”的话，那么阳明的论点就是“相即”。朱子认为居敬和穷理相应，心与理相应，而阳明则认为“心即理”；“体即用”；“道即器”；“器即道”。如上所述，要从“相即”的观点看，他的一元论是成立的。阳明死后阳明学分成左右两派，左派的龙溪王畿（1498—1583）及极左派的心斋王艮（1483—1540）、王东崖、何心隐、梁汝元、卓吾、李贽等，将阳明的自由主义无限夸大，并超越身分等级搞起了群众运动。当他们将心称为理的时候，其理则无法排除浑然一体的理想欲，而成为“必潜于心的东西”。

在“心即理”这一心理论和“性即理”相对抗的情况下，心的情意部分，也就是情欲部分也只能称为浑然一理，它作为“人之自然”向良知的固有性和“满街都是圣人”发展。这种自我主义、带有个性的积极主义，将情意和心知都贬低为“假”即伪善，

参见《传习录》下

② 同上书。

“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传习录》下）

从而使“真”显现出来。良知即真的原理极力排斥伪道学，虚假的态度到李贽时达到了高潮。在李朝时期，从许筠开始由张维、崔鸣吉、郑齐斗、李忠翊、洪大容、李建芳等人继承，均把它当成了攻击朱子学徒虚假性的武器。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阳明学向韩半岛的传播是从阳明在世的时候就开始了的。笔者也曾根据《西厓集》认为起始时间是明宗十三年（1558），但目前根据朴祥（1472—1530）的《讷斋集》和金世弼（1473—1553）的《十清轩集》判断，《传习录》初刊本传到韩半岛那是中宗十六年（1521），也就是王阳明 50 岁时候的事。因此，我认为，将初刊本的刊行时间（1518）往后推 3 年，即公元 1521 年才是正确的。由此可见，韩半岛的阳明学派是针对虚假化的性理学，与西学及朱子理气论的批判势力实学派相互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对那种认为朝鲜朝时期阳明学没有形成派系的看法是需要重新认识的。

第二章 阳明学排斥说

李滉斥陆九渊、陈献章、王守仁的学问为异学，其批判的要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陈献章、王阳明的学问是以陆九渊之学为出发点的，表面装作崇儒，实则信佛。

二、笃信唯心论，不以物之理为然，认为所有事物皆为心障，唯有排除心障，本心、良知的作用才能得到自由发挥。[†]而言之，六经为心之支柱，凡事可从心得，不一定非读书不可。

三、其学知行合一说与究理之心相悖，阳明不辨感觉与义之差异。

四、阳明所谓的性实为古时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之理，但未认识到纯属理之本体的仁义礼智四德就是“本然之性”。

五、阳明百般排斥朱子，因此，其人品值得怀疑。

六、说朱子晚年有定论实为欺人耳目，其罪恶至深。朱子晚年的定论实为阳明学的专断。正如传言所说，讷斋朴祥和十清轩金世弼都认为阳明学传到韩半岛，当朝鲜儒生尚不理解其主张时，先生将《传习录》斥之为禅学，并对金世弼以三绝诗和答[‡]，金世弼则写下了“阳明老子治心学，出入三家晚有闻，道脉千年传孔孟，一毫差爽亦嫌云”一诗^②，其批判之意一目了然。其后，月川赵穆、西厓柳成龙、月汀尹根寿、月沙李廷龟等均反对阳明学。

赵穆对李滉说，“陈献章和王阳明的主张均与程朱流派的观点

参见《讷斋集·附录卷 4·年谱》

参见《十清轩集·卷 2·诗》

不同，尤其是像阳明这样的人十分怪癖，若无先生之雄辩，担心会惑乱民众。”柳成龙对阳明学也进行了批判：“第一，阳明学虽富实践性但心中并无准则。若持主心说，正好会滋长猖狂妄为之弊端；第二，阳明称，孝之理在我心中，父母在世与不在世孝心不变，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孝道自明；第三，阳明并不读书，只主张致良知，哪会对一切事物皆了如指掌。陈献章不精道学，阳明以儒学代替禅学。第四，虚灵为心之本体，知觉为心之作用，心中所藏之理即仁义礼智，也就是所谓的性。若将虚灵和知觉均归为性，那必然与佛学相近。格物致知的知也说的是心知，物说的是物之理。于阳明将致良知视为学问的精髓，贬朱子学为支离破碎，属外道，此即为佛家学说。”

又，眉岩柳希春在《经筵》中说：“王守仁自诩圣人，严斥朱子，并喜闻中国怪诞之众徒随声附合，陈建为此还写下了《学鄣通辨》，此实为斥异端之正论。校书馆应将此书付梓，湖南、岭南地区亦应效之。”^①

尹根寿针对陆王牌位被供奉于文庙一事说，“明朝之所以要把陆王的牌位供奉在文庙之中进行祭祀，是因为不崇尚朱子的缘故。我们国家的文庙供奉礼仪，应该遵循我国的旧礼，不一定要按明皇的办法去做。”他又针对张维写道。阳明对朱子来说就是杨朱和墨翟，又举徐即登撰文批评阳明的例子以说明阳明学有害无益。

李珥称“王守仁认为朱子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其学尚须斟酌”^②。话虽如此，但他自己所创立的栗谷学却多受明朝学风的影响^③。此外，他的理气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庶孽通仕”或“勿论士族庶类”观和在实际上允许庶民进入自己隐居之处或府邸的自由主义思潮及他的“相即”逻辑，即互相融合理论，以及他所

① 参见《眉岩日记》

② 参见《栗谷全书》

③ 栗谷为朝鲜李朝著名哲学家李珥的号，其学派人称“栗谷学”。——译者注。

主张的“一心不实，万事皆假”^①说，还有，他在《圣学辑要》中将“诚实篇”单列为一章，而将“居敬篇”不单列为一章的做法，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似乎与阳明学是有关系的。甚至就连南溟曹植^②也说其“学问稍涉阳明”^③。可见，当时对新学问研究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南溪朴世采以郑齐斗信奉阳明学为内容，撰写了《王阳明学辨》一文，从逻辑上对其进行批判。此文与李滉的排斥阳明学理论和陈建的《学蔀通辨》异曲同工，也对阳明学的本质进行了驳斥。

首先，该文从内容上讲是分为“古本大学”、“大学问”、“致良知”、“朱子晚年定论”四部分进行批驳的。

综合南塘韩元震的《王阳明集辨》以及《退溪集》、《罗整庵集》的分析并加以整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心即理”是阳明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是“心即佛”的翻版，也是和“即心即佛”的这一佛教说是一致的。

二、致良知是阳明学的根本。《大学》里所说的“致知”是是非非、善善恶恶的“知”。我们圣门所说的“致”虽不无良知，但阳明所说的良知却是佛教所说的灵魂“知”，并不是孟子所说的仁义的良知。因而，将心说为理，将觉说为良知实际上和佛教的道是一样的。

三、知行合一也是阳明学本质的东西。这一主张是说此种观点只是指心术邪僻而言，是以邪心为出发点的，凡事求捷径、快当，讨厌繁琐，喜欢方便，因而才废弃穷理学，以求得所谓的直截简易，从而使自己的新主张树立起来。这种知行才能称之为合一。

参见《圣学辑要》。

曹植，朝鲜李朝时哲学家，号南溟——译者注。

参见《李朝实录》第33卷。

参见《试评李朝阳明学的研究及其扩散》。

此外，他引用阳明《大学问》中的 6 条，《答罗整庵书》中的 4 条和《答顾东桥书》中的 12 条进行了批判，在最后的 4 条中对卓吾李贽的观点进行了记录。

万历三十年 壬寅 张问达非难说“妖士李贽的《藏书》一书系惑世诬民之作，^①倡男女无别。写下了观音问一书，引诱士人妻女，疯狂乱伦，无以复加”后，此人被下狱，该书遭焚，作者自杀。李贽系泉州人，科举及第，官至姚安知府。李贽曾编《阳明年谱》，批评过《阳明集》一书。为此，韩元震曾指出，阳明学的学者原来如此。丁若镛撰《致良知辨》一书，批判了阳明的良知说。丁若镛虽然对阳明学派的主张理解得很深，但他对其根本是阳明学还是程朱学作出判断，也许是力图超越宋明学从洙泗的原始儒学中寻找答案的缘故吧，在这一过程中阳明学也成了他的批判对象。其内容如下。

第一，王阳明以“致良知”三字为其宗旨，用一句话作为宗旨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异端邪说。杨朱将“为之”二字作自己的宗旨，陆九渊用“尊德性”三字作宗旨亦为异端，因而阳明的“良知”说也不例外，应算之为异端。

第二，“致”与“良”风马牛不相及。良为天然之意^②，良田、良马就是其例。良本意为“善”，无须去“致”。“致”为“招致”之意，自力难及，借助外力以成其果为“致”。“良知”就是“良知”，如何去“致”。因而，我认为“良”并非“致”；致，亦并非“良”。已然为“良”，欲“招致”使其良者何也，天下无此情理！

第三，可是，阳明确从良知中获得了力量。他乐善好施，善在心中萌发，锐意果敢，此为“良知”。可是，学习这一知识的人，为此而动心时，既不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又不进行研究，就照着

① 参见《南塘集·杂著·王阳明集辨》一文。

② 原文如此。——译者注

去作，便以为此即“良知”。因为素质差者多如牛毛，其错误理论无疑只会造成很多无知之人，因而也就成了大忧大患产生的根源^①。

从上面的论述就可以知道，不少人攻击批判阳明学，斥其为异端，所以，我们的阳明学传播就遇到了阻碍。在这种情况下，其脉络或是通过文艺作品表现出来，或是通过书画表现出来，就像那夜间的萤火虫时隐时现，到了学者霞谷时才形成了学派，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很不活跃，只是到了朝鲜李朝末年才“大器晚成”，成了韩国光复的精神力量。

据沧江金泽荣说，开城人金宪基在正祖皇上时及第登科，宪宗八年 69 岁时与世长辞。此人“作致良知辨数千言，以驳王守仁，大概以为良知气也，良知之所知，乃天理也，而守仁误认气为理云。”^③

从以上情况可以知道，批判王阳明的思潮一直存在了很长时间。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封闭的李朝社会得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因为这一社会是用“封闭的社会”、“封闭的道德”来压制新生的、具有创造力的社会力量的。

参见《与犹堂全书·致良知辨》

② 指 19 世纪末。——译者注

③ 参见金宪基著《重编韩代崧阳耆旧传》。

第三章阳明学的被吸收、 接纳及其发展

《传习录》一书一传开，大家才知道了王阳明的生活年代，此时朴祥和金世弼之间才展开了讨论。从历史记录看，最早的阳明学信徒当推东冈南彦经和庆安令李瑶。只有履素斋李仲虎及惕庵金谨恭的师弟崇尚心学。据传，金谨恭是李瑶的老师，因此，有人推测李瑶研究过阳明学，但至今无文献可考。

南彦经是徐敬德的门客，但同时又与李滉一起云游过，据说曾与耻斋洪仁祐在阳明学方面有过书信来往。

从《退溪集》的《答南时甫书》和《静斋记》看，首先是主张“一气长存说”的，认为“虚静微妙之状乃气之伏而先天之体，生动充满之状乃气动而后天之实。”

其二，反对李滉的“静时气不运，理自然存在”的主张，同时也不接受“理非静有动无，气也非静无动有”的主理说。

其三，南彦经说“湛清之体与上下天地同流”，“自然就不会没有理动之物，也不会没有之时。原因在于我们的努力是不分时间和地点的，所以并不需要人为的努力”。

王阳明称，“理为气之条理，气为理之动用。无条理，谈不上运用，无运用就无所谓条理”。^①“太极之生乃阴阳之生”。^②要把这两点一起来进行分析的话，湛清之体也可以意味着理气合一之良知，已为良知，若说“无须用力”时其观点与王畿的现成良知相

参见《传习录·答陆原静书》。

参见《传习录·答陆原静书》。

仿佛。若人能显现其本心，一切障碍则会自行消亡，因而实无刻苦之必要。

其四，“涵养体察为我之宗旨，天理与人间之理并非两种事物。”这句话若从“心即理”的角度看，天理也并非客观存在，而是人间之理，也就是我心。

其五“慎独乃为着日用而进行的最好学习”³，真所谓努力乃无意、无欲”。慎独在阳明学中是代替朱子学的居敬而采取的修养的根本方法。无意、无欲也是阳明左派所特别强调的。

其六 李滉称“时甫前次所言心有善有恶 其主张大错”。南彦经的“心有善有恶说”似与绪山钱德洪的“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有善有恶为意之动”有一定关系。

譬如，主气说、慎独、心有善有恶说中的气在阳明学中指心气，因而，它只是心性所说的气，而不是程朱学所谓的存在论的气。可是随着吾人学界理气说的兴起，朝鲜阳明学人大都对理气表现了很大的关心，采取了主气说。

阳明学对存在问题没有什么关心，但在论及此点时用了气哲学这个概念。良知之动为气，并随时随处都有，这才是既为理又为气者。因之南彦经所说“如果说静时气还没有作用于静的话，所谓的气在静处无而在动处有。所谓理在静处明而在动处暗，那么怎么能说理气合一流行有无穷之妙呢？因而可以说，理气合一之妙即暗示着良知。”

据传，李瑶独深信阳明学说，瑶学于南彦经。宣祖和李瑶对心学进行了问答。

宣祖言，若按南彦经之说用阳明学来治国可一扫倭寇。阳明才气过人，吾人才气低下，难以学之。谓“常省吾心”的主张很对。阳明的意思要先正其心，事事必求正当，阳明的主旨为致良

参见李能和著《朝鲜儒界之阳明学派》：“唯宗室庆安令李瑶，独深信阳明学说，瑶学于南彦经。”

知。

弘文馆应教柳拱辰及副修撰郑晔发表了反驳李瑶的文章。

第一，王守仁（阳明）之学乃合仙与佛，借儒之名而成。第二，大禁读书，得独悟，排斥程朱先知后行说的李瑶是一个丧心病狂者。第三，陆九渊、王守仁之学为禅佛之脉络，自称祖述，主张排斥李瑶之邪见而请求恪守正道^①。

如上所述，我国的阳明学一开始是被当成邪见和异端的。就像体制守护者本身反体制主义一样愈演愈烈，阳明学被视为异端已经定型。实际上阳明学的自由主义倾向和个性主义对理哲学来说是一种反抗的有在。具有对程朱体制的反体制基础。谿谷张维的无实在内容的吾人学术之批判就更将其露骨化了。这也可以称之为对封闭的学术、思想的自我批判。张维（1587—1638）在朝鲜阳明学体系的建立上是起了垫脚石作用的一位学者。郑齐斗是通过《谿谷漫笔》受到启发的，崔明谷也是通过《漫笔》才关心起了《传习录》的。张维为了证明阳明学并非禅学，他说“因白沙学偏重于静，因而有混淆于寂之嫌疑，阳明的良知只把学习放在自我反省和扩大知识上，经常告诫自己要喜静而厌动。”^②只在穷理和格物上与程朱有所不同。

要论谿谷思想的特点的话也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他和南彦经一样是气一元论者，只是张维气学不同的是把老庄及阳明和李珥、金长生的气综合了一下而已。从这里也不难窥见“好老庄之道”的遗风来。

“气的本体是极其虚无的，往前无始往后无终，大无际小无心，无处不在。此虚谁也难得，谁也难失，谁也难让其死，谁也难让

① 参见《宣祖实录》。

② 参见《宣祖实录·27年》。

③ 参见《谿谷漫笔》卷1第39页：“白沙之学，诚有偏于静而流于寂者，若阳明良知之训，其用功实地专在于省察扩充，每以喜静厌动，为学者之戒。与白沙之学，绝不同。但所论穷理格物，与程朱顿异。此其所以别立门径也。”

其活，因为天地万物没有不是气的。”^①

所谓气的绝对性、普遍性、永恒性分明说的是气是带根本性的实体。如是，谈及宇宙中的客观存在——超越两内在实体时，就把阳明的良知——气更加宇宙化了。从“心即理”的论点出发，良知并非客观而是主观的宇宙生命力。因而对张维的立论应从根本上看作心气就是良知之气。

其二，他主张心性一元论，陷入了唯心论。“性是心之理，心是性之器”^②。“人之所有，皆气质之性也”的说法和心性相即，即“道即器”的论点是一脉相承的。它是表现气一元论和上下整合性观点的一例。

“人心道心这一章是千古心学的雏型，从洛闽以来很多说法都不尽相同，同与异相互交错。我认为，若真能使用‘精一’二字，即使各种学说纷杂一时，最后还是会归于统一的。”^③

心学即心之修养，其意含于“精一”二字。东坡苏轼兄弟企图打破二程之居敬说；陆九渊称“反身而诚”为本心而无视居敬；阳明也是强调立诚、慎独、精一而排斥居敬；张维的精一也反对程朱的居敬。

其《杂述》一文郑齐斗也有所引用，他说，通过目、耳、鼻、口等感官可得色、声、嗅、味，心具有知理之能力。可是，目虽能视但不能辨色，辨色乃心之作用。同样，声、形、嗅、味等都是主观的心的作用。因而，对心之理的认识也在于主观作用。心的作用通过感官获得，视、听、嗅、尝等为心（主观）的作用。声、形、嗅、味是以物为对象的，物为理。可是，没有心的作用就不可能认识理，即使所有的判断都通过感官，但如果没有心这种判断也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们的认识作用才被说成是主观的心

参见《谿谷集·卷3·杂记》

同上。

参见《谿谷集·卷4·似道心说》。

的作用。以上这种认识似乎是以阳明的以下观点为其依据的。

“耳目口鼻四肢虽为肉身，但听说动却都是心的作用。可是，即使心想视听说动，如果没有耳目口鼻四肢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没有心也就不可能有肉身，如果没有肉身也就不可能有心。”^①

从张维和阳明的主张可以看出，感观和观念相互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的认识也是依存于感观和观念的相互作用的。因此，郑齐斗才说：“当观谿谷老于阳明之书，唯其父义见解之熟，故一见便会无不得其要领。”^②

其三，张维责备我国学界没有实心、实事、实功、实得和志气，并对其封闭状态进行了批评，他主张自治、自立和自主。他这个观点是以阳明学尊重自由、个性为其根本的。

中国学术多种多样，有正学、禅学、道教、程朱学和陆学等，而在我们国家，不管其有知无知，只要是拿本书能认字的，就只知程朱不知其他，其原因在于没有一个真正的学者。没有实心的学问或对学问没有实得，过于拘谨，缺乏志气，耳听口说的都是程朱学的贵重，行动上表现的也只是在表面上进行捧场。没有实心向学，也无志气，只会表面捧场，这不是假学问又是什么？这便是朝鲜学界的实际情况。他对当时学界追逐个人名利的堕落情况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究其根源就是他认为这是自治、自立、自主心缺乏的表现。

“人必自治而后，可以不待物矣，自主而后，可以不附物矣，有守而后，可以不随物矣，羞不义而后，可以免于窃物矣，恶不仁而后，可以免于害物矣。约而言之，义利之辨而已矣。”^④

① 参见《传习录下·陈九川记》

② 参见郑齐斗《谿谷集·答崔汝和书·锡鼎》。

③ 参见郑齐斗《谿谷漫笔》卷1，第24页。

郑齐斗《谿谷漫笔》卷1，第58页。

大概这也可以算是对陆九渊义利之辨的一个解释吧。他同时警告说，人只有自治、自主、自立，才能实行仁义，才不会成为只知仿效他人的假人，也才不会成为侵害他人的人。他还谴责说，与主体的人相反的是鬼、妖、贼和豺狼。

“待物而立者，婴儿也；附物而成者，女萝^①也；随物而变者，影魍魎也；窃物而自利者，穿窬也；害物而自肥者，豺狼也。”^②

这些待物、附物、随物、窃物、害物的非主体性的人，其本应有的良知和良知的自我拓展都是缺乏的，它们只不过是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的鬼和黑影子。存在这些东西的这个世界，不是虚和伪的世界又是什么呢？因而，作者才说：“依阿矫伪之习，日以益增，诚实质直之道，日以益丧。”^③

其四，张维在他的《支离自赞》中对朱子学的支离破碎提出了非难，讽刺和批判了客观的穷理和居敬。即物穷理和居敬与我们的心性修养不合，慎独反更为切合实际。因而，他才写下了《慎独箴》一文：

“有幽有室，有默其处，人莫闻睹，神其临汝，警尔惰体，遏尔邪思。”^④

如上所述，慎独就是神的降临，要像站在神面前一样进行自身警惕，要具有防止邪思，实现良知的虔诚的心境。慎独是区分人与禽兽的分界线，也是吉凶的先兆。

① 喻缠人的妖精——译者注。

② 《谿谷漫笔》卷1，第58页。

③ 参见《求言应旨疏》。

④ 《慎独箴》。

他指出了“中庸章句”的错误：

“因言戒惧慎独致中和之事，此即修道之实也。修是修明修治之谓，犹君子修之吉之修也。章句曰，修品节之也，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以品节释修字，本文见亲切。”^①

他以这种见解对朱子的“中庸”章句进行了反驳。所以，他才认为修并非明心、治身，品节就是修行礼乐刑政，戒惧、慎独就是致中和。作者认为，这意味着心身的修养，心身的修养主要说的是戒惧和慎独，即是说，这和朱子一样，指的不是修物的修，而是修心的修。从这里也不难再一次看出朱子学的歧路之点来。

这样一来，他的观点就和程朱的客观主义或主知主义相对立了。

“先儒以穷理为格物致知之事，专属于知。唯王阳明认为兼知行而言，范淳夫曰，自君臣而言之，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此穷理也，与阳明之说合。”^②

这是对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一个说明，是对主知主义的批判。它强调行动，主张我们的知性，即为着实际行动这一目的时才是成立的。没有行动的知识是不会带来变化或创造的。无事可做自然就不会产生欲望，以行动为前提才会有欲望可言。我们只有在行动的过程中才能作出计划，进行实践和检验并进行修正及创造。因而，歌德（1749—1832）才说：“想着容易做起来难 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就更难。”

迟川崔鸣吉（1583—1647）和张维一起是“仁祖反正”的元

① 《谿谷漫笔》卷 1. 第 6 页。

② 《谿谷漫笔》卷 1. 第 22 页

勋，有不少人说他使“丙子胡乱”变成了现实，但事实是他使国家得到了安宁。据说，处于国乱时期的他，是从阳明学那儿得到了很多教益的。他单枪匹马冲入乱营，在他冲杀之时御驾到了南汉山，皇上一到南汉山便被敌人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他发出了感叹：“今日之计非和即战，战无可信军士，和众人厌之。在一座孤城中陪着君王，社稷之事以后如何是好？”后来，他主动提出议和，在订立城下之盟后独步和尚不得已发出了与明朝讲和的通告，这件事被清朝得知后将他在沈阳下了狱。此时，斥和者金尚宪也被关在旁边的牢房里。在牢里，他写了一首诗，认为斥和是墨守陈规，主和是权宜之计。

崔鸣吉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从阳明学学来的。他所写的《寄其子后亮书》和《复斋箴后说》就是阳明学观点，其曾孙崔昌大所写的《迟川公遗事》就是其佐证。其孙明谷崔锡鼎在《迟川行状》中写道：“祖父是 14 岁时在家自修的朱子学。”曾孙崔昌大辩解道：“曾祖父和谿谷年轻时在研究过程中读的陆王书，他读书喜欢择其本而落其叶”。开始两个人都醉心于阳明学，只有曾祖父从中年时才明白阳明学是有缺陷的。昆仑父子之所以要极力说明他们搞的不是阳明学，是因为他们因阳明学而遭到了党争之祸。崔锡鼎的《礼记类编》说，因为脱离了朱子学而遭焚书，从这句话不难推断出，他们在心底确实是一个阳明学学者。

崔鸣吉在给他儿子的信中有下面一段话：“我在信中写过，‘在人际关系中对方的本来面目只有在恍恍惚惚的关系中才可以依稀看到，你是不是学问还没到家呢？’因为我明白我能这样检讨和省察自身感到很高兴。阳明书上称，‘心本为活物，若长守我担心心底会得病’。这是他的切身体会，用一句话就交代明白了。阳明是个高人尚且如此担心，何况你现在正处于逆境，怎么能和常人一样泰然处之呢？此时你突然刻苦学习，过于苛待自己，我不能不担心你会生大病。就是对一些很平常的言论或行动也要时时头脑清醒，不要总是放心，要时不时地静坐和默观，以择取天机

之妙。无论何时，只要觉得自身之体合了鸟飞鱼跃的天之法则，哪怕被关在笼子里，心里也会产生一种自我陶醉之意趣。自己高兴就会忘掉烦恼。不管怎么说，你的起居饮食还是自由的，虽然语言风俗各有不同，但他们并非不是我们的同胞。天生下来的七情六欲相差不大。你同他们在一起，总比同木石、麋鹿这些动植物在一起强吧。所谓的本来面目应常处于虚明澄澈状态和喜怒哀乐之间。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古人在修养上将其称为动静一体。不管日月寒暑如何变化，风云烟雨处于何种状态，在道体动作的同时，用我心知的作用就可以使自己成为浑然一体的东西。省察达于此，对于自己的道体有所认识，依稀模糊之见也可变得清晰；久而久之，人际关系自然就会得熟知起来。你只有达到了这个境界，心老往这方面想，久之自然会获得力量，你现在遇到了一生中还未遇到的事，只要不想造成更大的难堪，就要去依靠这种力量。我就对你说到这儿，日后我们父子相见再谈分手后的各自情况。我希望那时你能让我刮目相看。”^①

丁卯和丙子两乱以后，大臣子弟都被当作人质关在沈阳，所以这篇文章应该是一封家书。与《后箴第六》中的“他人不知自心独知”的言词结合起来看，他分明是主张王阳明的“心即理”、“事上磨练”“良知独知”的。